

第一块砚到我手中,缘自我习画之必需。此砚为端砚,形制普通,正圆形,径七寸,周围一圈矮沿,无任何做工,却制做得十分精整规范。

我于砚,只讲“实用”。此砚正合我用:质地细腻,却很下墨;研出的墨汁细又浓,以水化开,可分五色。我从老一辈书画家那里学得爱惜砚的常识。比如磨过的墨,一定要将墨放在墨床上,不可停放砚上,否则墨会粘砚面,墨的胶大,粘得很紧,倘若硬去掰墨,就会损伤砚面;再比如每画过画,都要清洗砚石,洗净残墨。古人把洗砚的池塘,称做洗砚池。还有许多文人洗砚的佳话传世。

我这块看似平常的砚石,每每在洗净之后,方显露其本色的

非凡。不但黛中含青,绿如深树,而且石纹全都显现出来,仿佛一些飘动的牛毛,轻盈优美。一位懂得砚石的客人来访时见了便说,这砚石出自广东端州的老坑,从其形制和砚心下凹的情形来判断,应是晚明之物,这使我对它多了一份爱惜之情。

与翰墨丹青打了一辈子交道,碰到的好砚自然许多。但那些好砚只是玩物,惟有此砚称得上我书画人生的伴侣。半个多世纪里,它默默地源源不绝地为我提供“生命的原浆”,我视它不只是一件使用工具了。

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画家的画室发生根本的变

端砚

冯骥才

此绝迹于案头。

我这一代应是最后的研墨作画的一代。

于是,我的这块端砚便带着个人绘画史的记忆,由原先应用的物件转变为一种纯精神的纪念品,陈列在我画室一张案桌上。这张案桌上还有几块颇值得玩味的古砚。一是砖砚,砖的一侧刻着五个字“升平元年制”,升平是东晋年号,气质古朴凝重;一是汉瓦砚,上书“永寿嘉福”,鸟虫篆体,灵动秀异,有一种神妙之感。另两块一是唐代斲箕砚,三彩釉;

一是宋人的抄手砚,陶制,形制都美。还有一块长方形紫端小砚,上端凿一磐状水槽,刻工精雅。此砚背面保留天然石皮,侧面镌刻一行楷体边款“温润而泽,缜密以栗,亦刚亦柔,惟玉比德”,下署“荪湖铭”。我看这块端砚至迟是明末清初。现在把它们摆放在一起,也算是“贯穿”了砚的简史。

十年前赴皖南,登黄山,在徽州得到一块虎斑眉纹歙砚的原石,有石皮,一尺多大,重二十余斤;浑圆厚重,光滑滑滋,十分可爱,虎纹自然而天成,应是世所少见。当地人问我要不要请一名家雕刻,要我龙要凤要云要水随我挑。我听了忙摇着双手说不要。古往今来,多少好砚石叫粗俗的雕刻糟蹋了,还是一任自然为好。



边看边聊

严建平兄送我三大卷《严独鹤文集》(严建平、祝淳翔编,2021年9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初版)已经半年,应该为这位著名报人、作家写些什么了。好事成双,著名画家丁悚的《四十年艺坛回忆录(1902—1945)》(2022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初版)也问世了。丁悚与严独鹤是文坛好友,回忆录就多次“忆”到严,正好放在一起谈。

浙江桐乡,人才济济。我以前只关注茅盾(沈雁冰)、丰子恺、钱君匋等新文学健将,却忽略了严独鹤、沈苇窗等通俗文学名家,这当然是很不应该的。严独鹤比茅盾大七岁,也是同时代人,但两人的追求有所不同,一在新文学上执大旗,一在通俗文学上显身手,严独鹤的长篇《人海梦》就写得很不错。两人有一点是相似的,茅盾曾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严独鹤则在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当编辑。严独鹤的人生转折点是1914年受邀到上海《新闻报》任副刊编辑,主编《快活林》(1932年后改名为《新园林》),与主编《申报·自由谈》的周瘦鹃堪称双壁,各领风骚达数十年之久。难怪木心在《塔下读书处》中说:在当时“乌镇人的口碑上,沈雁冰大抵是个书呆子,不及另一个乌镇人严独鹤,《申报》(应为《新闻报》——笔者注)主笔,同乡引为光荣”。

严独鹤编《快活林》那么久,颇多功绩,自不待言,但我以为最大的功绩,是把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引进海上。1929年春,严独鹤参加上海报界观光团赴北平等地考察交流,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在北方已经有文名的张恨水。两人由“文字神交”而一见如故,张恨水答应为《快活林》撰写新的独家的长篇连载。这一答应非同小可,催生了张恨水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啼笑因缘》。1931年12月,《啼笑因缘》在《快活林》连载毕,将出单行本之际,严独鹤又撰《关于〈啼笑因缘〉的报告》和《〈啼笑因缘〉序》为之推荐,《序》是评论《啼笑因缘》的一篇力作,对这部小说艺术特色的条分缕析,今天读来仍使人神往。《报告》中说,张恨水的作品以前“大都刊在北方报纸上,南方阅读者诸君,似乎还和他很不认识。”随着《啼笑因缘》的连载,“竟有‘啼笑因缘迷’这样一个新口号”,1931年也成了“张恨水年”。这就意味着张恨水正式登上上海文坛,融入了“海派文学”,意义是深远的。而这一切都与严独鹤的努力分不开。

那么,严独鹤又是怎么当上《快活林》主编的?以前我们一直不知详情。丁悚的《回忆录》揭开了其中原委。丁悚在《张丹斧怀恨严独鹤》一文中如是说:《新闻报》向来没有报屁股的,后效仿《申报》的《自由谈》,也拟增开一和《自由谈》类似的副刊,俾和《申报》对峙,正在物色主编人选时,这个消息给丹斧知道了,颇有意企图膺任,以他的资望和文章,当然胜任愉快,自问也舍己莫属,不过馆方以张之文字固佳,但似不大合大报副刊体裁,结果就请了严独鹤担任,《新闻报》遂有《快活林》之创刊。问世后,获得广大读者的欢迎……

原来当时还有这么一段文坛纠葛。但幸好《新闻报》聘请了严独鹤,否则,《啼笑因缘》能否诞生,张恨水能否进入“海派文学”?都是未知数了。

忽略的模糊印章:“寿国公”是高汝砺的印章……当然,这并不代表画作的水准就低,只是因王希孟尚稚嫩,在政坛、画坛尚未有足够的影响力。可以支撑这一判断的还有编成于宣和二年(1120)年的《宣和画谱》,其中收录北

宋重要画家100多位,擅长山水的画家有28位,并无王希孟的大名。这么判断,不是轻看了王希孟和他的《千里江山图》。恰恰说明,在整个宋代绘画的艺术水准达到了何种高度。连这么名不见经传的画家的作品都这么让人震惊,更何况那些已经失传的很多高等级画作。

从传播学角度,也非常令人回味:时光这个东西,既残酷,也非常诡异。曾经的无名小辈的画作,千年后成为世界艺术顶级的藏品,而有些录入画谱的当时赫赫有名的艺术家,很快就落到了尘埃中去了,后世还有几人记得他们的大名呢?传世的名声是与不朽的作品,紧紧勾连在一起的。否则,一时声名,就会迅速飘散在时光里的烟霞中。

长期以来,蔡京以“奸臣”这一脸谱化的形象标签,存在于各类历史读物和影像中,《蔡京沉浮》遵从鲁迅“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理念,力图客观呈现蔡京的多面人格。不知读者在读过《蔡京沉浮》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

严独鹤编《快活林》

陈子善

壬寅春节晚会后,有几位友人向我询问“你写的那本关于蔡京的书中,涉及到蔡京与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么?”弦外之音是,一部写蔡京的长篇历史非虚构作品,不应遗漏了这一重大事件。

我回答:“有啊!”并随手把案头正在二校中的书稿的有关页面拍过去。

但这一事件,在蔡京生活中实在算不上“重大”。春晚的一档舞蹈节目《只此青绿》惊艳受众,而这档舞蹈节目,是根据宋代王希孟画作《千里江山图》呈现的青绿山水意象编创出来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此图与蔡京有啥关联呢?当然有。目前无

论大众还是学界,所了解到的关于该图作者的背景和创作信息,唯一靠谱的历史记载,均来自蔡京在画上的题跋:“政和三年闰

四月一日赐,希孟年十八,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王希孟的大名因蔡京的题跋而得以传世,后人获知此画作者为“希孟”。至于后来为何演变成了“王希孟”,并无可靠的依据。给“希孟”加上姓氏,已经是清代人的说法。至于“希孟”为何姓“王”,而不是姓“李”“张”“苏”……无考。用我在《蔡京沉浮》中的一句话说:“我常常顺着历史的藤蔓摸瓜,但摸着摸着,发现压根儿就没有瓜。”

有研究者认为,既然没有可靠史料证明作者是谁,那就应该根据蔡京题跋,称“希孟”即可。作者应该姓“希”,不是姓“王”。我觉得这不重要,让后人引以为傲的是,在千年前的北宋就有人画出了如此震撼人心的巨幅青绿山水图。犹如今天学人还在为《红楼梦》作者是谁索隐钩沉、争得唾沫横飞一样,大多读者并不关心“蛋”是哪只“鸡”下的,

却着眼前的场所震撼。观看他们演出的志愿军战士,在演出结束后居然无法起身,因为他们的衣服和大地冻在了一块儿,这一刻他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能打赢战争,为我们的战士有钢铁般的意志。

剧院第二任院长刘安古老师告诉我的故事则让我明白了做儿童剧的意义。他说有一天下午他们刚演完《雷锋》,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剧场门口却多出了几个撑着小红伞的小朋友,说是一定要为他们遮风挡雨。

原本一小时的采访延长到了一整个下午,这个下午,我沐浴在温暖里。

前不久,我和儿艺学馆培养的第一批学员中的龚力群老

蔡京与《千里江山图》断想

陈歆耕



奋起金箍棒 横扫白骨精 齐天大圣 (设色纸本) 朱刚

谁都盼望春天,希望春天早点来,可是,诗人更急切,因为他们留下了盼春的诗。比如:唐朝的韩愈在《春雪》中盼:“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再比如:“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这是唐朝白居易,他在《钱塘湖春行》中盼:“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谁都怜惜春天,怕春天匆匆就走掉了,可是,诗人更加悲切,因为他们留下了惜春的诗。比如:唐朝戴叔伦在《苏溪亭》上说:“苏溪亭上草漫漫,谁倚东风十二阑。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再比如:唐朝杜甫写下《绝句》:“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今年,是宋庆龄先生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建院75周年,拥有75年历史的剧院,在中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么厚重的积淀不仅是剧院的骄傲,更是中国儿童戏剧的财富。

作为一个进剧院不足十年的专职编剧,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使我我对剧院的历史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那是在剧院70周年大庆的时候,我有幸担任纪念演出的串联词和朗诵稿撰稿,为此,我特地采访了剧院几位早已离退体的老艺术家,他们是当年宋妈妈的孩子,现在是剧院的长辈,我特意拟了一些问题,没想到我一个都没问出口,他们已滔滔不绝讲开了,那是一种对剧院真实情感的流露,充满着骄傲与自豪。

被称为剧院“活地图”的张

信治老师对剧院的历史沿革如数家珍。剧院是从昆山花园的一个铁皮房子起步的,那是中国福利基金会的第三儿童福利站,一群从上海贫民窟中挑选出来的少年,从此改变了命运,这11个孩子就是中国第一代儿童剧演员,是宋妈妈给予了

他们金色的童年。从昆山花园的铁皮房到四川北路横浜桥,从翡翠谷的四层楼到铜仁路的绿房子,几经搬迁的儿童剧团终于在华山路639号扎下了根,这座1949年前的英童公学从此换了主人,那里成了他们的家,也成了孩子们的向往和期待。

剧院老导演张承明老师则给我描述了一幅幅画面。在他们这些孩子长身体的时候,宋

妈妈特意给他们送来面粉和奶粉,当宿舍响起起床号时,他们会开心地高唱,“起来,起来吃大饼牛奶!”每天下午三点,是他们的足球时间,他们在剧院的大草坪上快乐地奔跑,场下,就连炊事班的人也要加油助威,后来不仅编出了一个足球

一家有厚度有温度的剧院

杜邨

舞,还催生了《小足球队》这个戏。他们去朝鲜慰问志愿军,零下40摄氏度的天气狂风呼啸,大风把天幕吹成了大肚子,演员们穿着齐膝的短裤和白纱裙,在炸弹弹边上台演出,舞美的同志们身后紧握着他们的手,给演员们传递着热量。当他们觉得自己很坚强的时候,